

Tiaoxingzhi xinlun

Zhejiang renminchubanshe

陶行知 新论

胡国枢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

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陶行知新论

胡国枢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行知新论/胡国枢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1

ISBN 7-213-02674-7

I. 陶... II. 胡... III. 陶行知 (1891~1946) —
教育理论 IV. 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7019 号

陶行知新论

胡国枢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李子才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张谷年

照排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杭州市玉古路 20 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1

字数 20.8 万

印数 1—1500

版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3-02674-7

定价 15.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胡国枢同志是我国陶行知研究队伍中的杰出一员，为陶研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为大家所钦佩！

胡国枢同志虽承担诸多学术研究任务，但把陶研工作一直放在重要位置，孜孜以求，从未稍怠。他对陶研理论方面的造诣，为同行所推崇；他曾长期具体主持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的工作，为在全省推动学陶师陶，不遗余力，成绩显著；他虽身在浙江，却心系全国，经常主动、积极地向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使我深为感动。

近悉胡国枢同志又对陶行知的全民教育、全面教育和全程教育（终身教育）思想有了进一步研究，并撰写成书《陶行知新论》，这是他的第三本陶研专著，是他学习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一个进步与突破，我心甚悦。胡国枢同志的这本新著，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与论述，对陶行知先生的人品、思想、历史作用作了富有时代性、世界性、本土性新视角的开掘，尤其是对生活教育理论与教育终身化、建立学习型社会关系的阐明，与陶先生的国际先驱地位的论述，都给人以新的启发。“三全”教育思想体现了生活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它与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确实都是“息息相通”的。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与创建终身教育体系并举，要改革考试选拔制度与经济、政治、教育的整体改革共进，要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

推进教育的系统工程，才能切实有效地全面提高民族素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这就是要使全民在全时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以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需要。我们越深入学习、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就越真切地感到其科学性、前瞻性和现实的针对性。他对陶研工作的一些建议也值得重视。如认为开发西部，“人本开发”、提高人的品德才干是实现西部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陶研要西进，也就在于学习、借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着重激发当地人民的主体意识、环保意识、现代生活意识以提高全面素质，持续促进农科教结合，这样西部开发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后劲。相信此书问世，会对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推进社会进步，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所以，我为胡国枢同志的新作《陶行知新论》叫好，并欣然作序。

方明

2003年2月2日

(方明，陶行知的学生，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因本书出版延期，序文原稿写得较早，在付梓前夕，方老再次亲笔审定。)

自序

“古有孔夫子，今有陶行知”。陶行知是一位影响现代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伟大教育家。

陶行知是中国历史上大起大落的人，既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①，又因歌颂武训讨饭兴学，在错误批判电影《武训传》时，一起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过了30年才平反。今天学习他、研究他，是因为他的身上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发掘，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对中国的现代化以及对人生都有启迪意义，他的教育思想——生活教育理论是博大精深的精神宝库，是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是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主体教育理论。陶行知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初的1891年，逝世也已半个多世纪，却仍如活着一样。2002年9月8日，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主席再次号召学习“陶行知先生当年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并强调“这种平凡而又伟大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②李鹏委员长多次题词：“学习、研究、运用、发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③李岚清副总理更要求大家“以陶行知先生为楷模，为办好我国全民素质教育作贡献”^④。的确，陶行知是影响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走向与现代化进程的教育家，他的精神与教育思想“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活在新中国的年轻一代中，而且还要活在中国将来的教育方针与教育政策中”^⑤。

陶行知不同凡响，他身上具有的很多特色正在启示着后人：

第一，陶行知是最富“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⑥的中华本土教育家。陶行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安徽歙县黄山脚下贫寒家庭，切身感受使他对饥寒交迫的祖国与缺医少学的农民的命运刻骨铭心：农村这么穷，人口这样多，文化素质这般低！了解国情、熟悉农村、贴近人民是陶行知身上先天的优点。他靠勤奋读书，又因母亲为教会学堂烧饭，他常挑菜入城，被该校外籍校长赏识，免费进新式中学堂，后考入汇文书院并入金陵大学，成绩优异，才成为留学美国的幸运儿。身在海外，心不忘本，被称为“最中国式的留学生”，立志回国从事教育，“要使全中国人都能受到教育”，毕生为改革传统教育、实现中国现代化而艰苦奋斗。他认定“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⑦，号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⑧。他脱去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到农村去”，“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成为“滚了几身泥巴”“亲民亲物”的地道的中国本土教育家。他创办的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幼儿园，都是洋溢着中国特色芳香的现代式学校。他“呼吸于人民大众之中，全副精力交给人民”^⑨，正如过去进步舆论公认的陶行知教育思想“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适合劳苦大众需要的”、“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⑩。他坚持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为治穷治愚、祖国富强毕生尽力，是“咱中国老百姓的教育家”。

第二，陶行知是最有革新精神的创造教育家。陶行知生活在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旧中国，那是个格外需要革新精神的时代。他早年崇奉明代集儒家大成的阳明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很深，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师事西方进步教育运动代表人物杜威，对世界现代教育发展了如指掌。可谓学贯中西，文通古今，思想敏锐，目光远大。他学习古人而不泥古，学习洋人而不迷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大教育观。

他是在中国 20 世纪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 30 年代新启蒙运动中获得滋养，又是推动这个新潮的风云人物。他厌恶当时中国教育抄习外国之风，“先抄袭日本，后来又抄习英、德、法，现在又抄习美国”，弄得毫无生气，认为“教育要有创造的精神”^①，尖锐地抨击使“中国学生愈学愈弱，愈学愈懒”^②的教育积弊，他直言不讳：“我反对束缚人们手脑和行动自由的传统教育”^③，认为“教育者要创造真善美的活人”、“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使中国造成创造的大气候好环境，“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④。他自己在一生中有许多创举，如创办全国第一所乡村师范、第一个学习型社团——山海工学团、第一所社会大学、第一所从激发人的艺术潜能来培养少年艺术英才的育才学校，他所倡导的小先生制、艺友制等均为国际教育界所推崇，他创立生活教育理论，倡导生活教育运动，不愧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有胆量创造的人”^⑤——一位出类拔萃的创造教育家！处在今天科技突飞猛进，挑战十分激烈的世界里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有千万个像陶行知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创造教育家！

第三，陶行知是披荆斩棘，勇于进取的开辟教育家。他是毫无畏惧、不怕困难的人。他认为中国人最致命的“一个病根，就是怕。怕难，怕苦，怕孤，怕死，就好好地埋没了一生”^⑥。他以“失败是成功之母”、“奋斗是成功之父”为座右铭，与患难搏斗为乐，提倡“抬头乐干”，坚信“不管风浪多大，我一定会游到彼岸去”^⑦。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令人敬佩又出人意料的巨大工作量，除了亲手创办了许多学校，还参加创办过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国难教育社、生活教育社等许多社团。由他支持发展的组织、单位，如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群众团体更是不可胜计。他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救国会的重要人物，并受 50 多个民间团体委派为使

26个国家与地区，宣传反对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是著名国际和平人士。他又先后发起教育救国的六大运动：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抗战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使他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不断推向新阶段。一个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书生赤手，又身处乱世，如果缺少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怎能取得如此辉煌业绩！他真是“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消极悲观、永远兴致勃勃、勇敢进取”，“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开辟教育家^⑮，而不是蛮干、莽撞，如他自己说的“生活教育社有一套理论，也有一套实施的办法”^⑯，是“知其要”、“有其才”，又要有“百折不回的气概”^⑰的“行动的理论家”。

第四，陶行知是充满博爱精神的爱心教育家。他为了“真善美的祖国，真善美的世界，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美的创造”^⑱而努力奋斗，抱着一颗赤诚的爱心献身教育，不顾自家的艰苦生活，将仅有的稿费、版税、讲演费、书法润笔费，甚至慈母的人寿保险金，统统捐作办学经费。商务印书馆送他《平民千字课》稿费3000元，他妹妹文溪想留四分之一作家用急需，而他却回答：“妹妹，你脑筋就缺少这四分之一啊！如果加上这四分之一，不是更加美好了吗？”终于一分不留地献了出去。“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里出来的”^⑲，此话不虚！他当校长，真正做到“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⑳，当国民参政员，宁可自己跑路，省下车马费给贫苦学生。最困难时，重庆育才学校，供应体弱学生每天两个鸡蛋难以为继，陶先生拿出自己一条未穿过的、从国外带来的西装裤，给学生掉换鸡蛋吃。天寒时，他常将自己的大衣披到学生身上，温暖过许多孩子，大家把它叫做“爱的大衣”^㉑。他爱儿童、爱青年，常说：“在我的世界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人是富感情的动物，教育不能离开爱，“试把二十四史从头数，那个圣人不多情？”^㉒在他爱的关怀下，不知培育了多少人才！也不知感

动过多少有良知的人共同战斗！陶行知的爱是大公无私的爱、远见卓识的爱、爱憎分明的爱、与真善美合一的爱，是他知情意结合、德智体并举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基石与灵魂。这块巨大基石与圣洁灵魂的化身，就是陶行知反复倡导的“爱满天下”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爱满天下”是陶先生的座右铭，也将成为新世纪人们的座右铭，成为全球一体化的精神格言，世界新教育的原动力！

陶行知是对中国教育改革与现代化有全方位贡献的人。如聚焦一点，他倡导生活教育运动，创立生活教育理论，是全民教育、全面教育、全程教育（终身教育）的倡导者与学习型社会的设计师。随着全球化、知识化、网络化的信息社会的临近，一轮新的教育改革高潮已在世界各国涌起。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推动下，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将进入新时期。陶行知“教育是立国的根本”^②的名言，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科教兴国”成为我国的国策。尤其当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上提出“当今时代，是要求人们终生学习的时代”，2001年5月15日，江泽民又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峰会上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以后，建立学习型社会已成为国内共识，学术界发表了好些颇有见地的文章，有的地区开始迈出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村庄、学习型军营、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等的步伐。然而不仅外国人，近来更有好些国内人士，把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看作进口货，归功于西方，认为“终身教育”是法国教育家保罗·郎格郎（Poul. Lengrand 1910—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教处官员身份，于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促进成人教育委员会上，作题为《生命全程的教育》的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同时还认为，学习型社会是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tt M. Hutchine 1899—1977）于1968年在他的著作《学

习型社会》中首先提出的。不错，这两位西方教育家对在上世界上确立推广现代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我们也不应抹煞陶行知早在20世纪前半叶，至少比他们两位早三四十年的，已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要把“社会办成大学校”。陶行知在1919年浙江第一师范对毕业生演讲时就提出：生活“天天变动，就是天天受教育，差不多从出世到老，与人生为始终的样子。你哪一天生存不是学？您哪一天学不是生存呢”^⑧？这可视作他对终身教育理念的最初表述。20世纪20年代，他在创办晓庄师范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中，形成了融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于一炉的生活教育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小先生制等一整套原理，为教育终身化、建立学习型社会，提出了系统理论。30年代他又提出要建设一个大学校，“四万万人都是先生，它的学生也是一样地多，顶少也有四万万。在这所大学校里，大家共同追求真理，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干到老，团到老”^⑨，创造一个“处处读书，人人明理”，“有大生命的中国”^⑩，这就是实现“整个民族现代化”、“整个生活现代化”、“整个寿命现代化”、“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⑪，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学习化的中国”，这样的论述在他的言论中俯拾皆是。更须着重指出的，陶行知的终身教育思想不仅是指个人终生的学习，而且是举国全民的终身教育，与西方学者大都指个人的学习不尽相同。陶行知的全民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成了密不可分合二而一的概念。1945年，陶行知用英文发布Educaton For All（《全民教育》），表明他不仅要让中国人民明白还要推向世界，在文中进一步明确解释其含义：“终身教育，培养求知欲，学习为生活，生活为学习，只要活着就要学习，一旦养成学习习惯，个人就能终生进步不断。”^⑫所有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陶行知是倡导全民教育终身化、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先驱，保罗·郎格郎与罗伯特·哈钦斯等是后继者，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

虽不相同，但走到一起来了，英雄所见略同。^②半个世纪的历史也证明着：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是世界发展的共同方向与必然趋势。更可贵的是，陶行知不仅有教育、学习终身化的理论，而且有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实践经验。20世纪30年代初，他与生活教育社的同志继创建晓庄师范以后，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在上海建立了山海工学团及其若干分团，这是亦工亦学亦团的学习型组织，可说是中国学习型社会的雏形，培养了大批青年，后来成长为优秀革命干部。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理论，他活着时生活教育社的同仁已开始研究推广，今天有更多的同志在实践研究，无论学术上、教学改革上都取得丰硕成果。经过60多年来一辈辈继起者的努力，生活教育理论的春天来了。首先，陶行知教育思想本身的科学性、时代前瞻性与中国本土性，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前途的契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很高的现代价值；同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逻辑一致性。生活教育早为中国共产党人所一再肯定，毛泽东主席就赞赏说：“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③。江泽民同志也说，“陶行知教育思想与社会主义教育息息相通”。党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说，“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④。今天，我们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政策、措施上，采纳了好多陶行知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有适合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土壤。中国教育改革需要陶行知教育思想作借鉴、作依托；中国的社会需要众多陶行知那样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事实正是如此，全国许多地方一股学陶思潮正在兴起，生动事例如雨后春笋。无论是长江三角洲苏浙沪与闽粤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四川、重庆等广大内陆，都涌现出学陶成绩显著的学校与地

区。我2002年专程去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先进县黑龙江省呼兰县调研学习，那是著名女作家萧红的故乡。这个县1998年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2000年被国家农业部定为全国农科教结合示范县，2001年又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此外，还先后荣获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县、省素质教育实验区、省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县、哈尔滨市农村综合教育改革标准县，以及省改善办学条件、省师范队伍建设、省扫除文盲、省普及实验教学先进县等30多项荣誉称号。我发现这个县的领导和干部，尤其是教育局长和普通中、小学校长，对陶行知农村教育改革的一些文章很熟悉，问他们这么大的成绩得来的经验是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回答，第一条是思想转变：教育观念真正地由单纯为升学率服务，转变到为农村经济文化政治建设服务，并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而他们依托的先进教育思想之一，正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呼兰县原来也是一个不挂牌的学陶先进县！又如吕梁山深处的山西省柳林县庄上乡前元庄，“丰年吃糠，灾年逃荒”，代代相传，穷得出名。自从1987年进行农村教育改革试验，村党支部一班人与村校老师一块学习陶行知关于《中国农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等文章后开了窍，认识到过去“乡村教育走错了路”，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民需要，也脱离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势，学校与农民两条心，教育与农业两张皮，从而确定了前元庄实验学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即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借鉴陶行知“教育与农业携手”，使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依靠发展教育，带动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他们走“村校结合”、“农科教结合”的路子，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在教材教学上又根据不同年龄、文化与需求，作实事求是的安排与适时的调整。15年的改革实践，成为“贫困山区办学的榜样”，出现了“办好一所学校，带富一个村庄”的可喜景象。农民人均收入从320

元提高到 2000 元、彩电从无到有 190 台、程控电话从无到有 50 台、机动车从 3 辆到 148 辆，普遍享受初级卫生保健与养老保险。随着经济提升，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 100%。成人教育分层次编班，16 至 45 岁村民基本达到初中文化程度。“早晨听广播，晚上进民校，庭院做试验，大田搞推广”，“山村瓦屋书声响，家家电灯亮”，一个学习型山村的雏形已经出现，农民现代观念开始形成，重教育、讲文明、学科技在村里蔚然成风。衣食足而知礼仪，村貌为之一变，建成了无打架、无赌博、无盗窃、无上访、无邪教邪说的五无村，10 年来，前元庄也就成为省级老文明村，党支部成为推不倒的“红旗党支部”。前些年吕梁地区抓点，在全区 2872 所乡村学校推广他们综合改革试验的经验，山西省以前元庄为基点，开展“科教兴村”，进而开展“科教兴乡”活动，2003 年 1 月 8 日举行表彰 100 个“科教兴乡”先进典型大会，一个有声势有实效的“科技兴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前进的序幕已经揭开，前元庄在继续前进，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关注，教育部与几个民主党派中央也很重视，《中国教育报》在 2003 年 2 月 13 日整版介绍前元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也积极宣传。教育界知情同志都赞扬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培养了一个好典型，为中国教育做了一件好事。布谷叫，春天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世纪，就是生活教育理论英雄用武之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就是生活教育理论英雄用武之地；一切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就是生活教育的主角，生活教育理论英雄用武的主人。今天有三类人都在学习、推广生活教育理论，一类是自觉地学与做；一类是不自觉地在学与做；一类虽不用生活教育之名而有生活教育之实，也在明不做而实做；甚至也有反对的，但却离不开生活教育的大轨道。凡是有志于提高民族素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人，生活教育理论是最现成的、也是最好的借鉴与武器，今天真正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班班航机飞北京”。即使是主客观条

件不那么理想之处，也是红梅花开，春天还会远吗！更多的地方，桃花含苞待放，春意盎然。当然我们不可盲目乐观，从生活教育观看，问题多着哩。天地人我，自然、社会、人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国际国内都会有矛盾，人心躁动，危机潜生，春季里还有秋冬呢！不必悲观失望，更不可坐以等待，学习型理想社会不会呼之即来，靠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以开智创新、富民强国、爱满天下为宗旨的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世界人类长远利益的一致性，中国教育发展趋势与世界教育潮流不可逆转性，生活教育理论不只是眼前的好运，而是“永恒的春天”，看咱们有无勇气去迎春，有无爱心去惜春，有无智慧去探春？

中华振兴，人类幸福是陶行知毕生奋斗的宏伟目标；社会建成大学校，人人享有终身学习的民主权利，是陶行知全力追求的崇高理想。正当这伟大目标与崇高理想，将在新世纪成为亿万人民大众的生动实践，化作活生生的现实，并必须借助生活教育理论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对陶行知先生作新的学习、研究、评价与弘扬，本人出版第三部陶研专著，定名为《陶行知新论》，用意在此。抛砖引玉，引出一批新作，迎接新世纪陶研新气象！陶行知是一位留下近千首诗、700余万字巨著的智者，他拥有未被完全“开发”的精神富矿，正如生活之树常青，教育改革与发展，永无止境，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开放的、宽容的、与时俱进的教育理论，是学习型社会的主流教育理论不可缺少的珍品，而不是狭隘排他、营私走穴的假货。我们要学习它、研究它、发展它。

牢记陶行知的警语：“仿我者死，创我者生！”^①

注释：

① 1946年7月25日，毛泽东悼念陶行知逝世的题词，见《爱满天下·陶行知名言警句》，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扉页。

② 见2002年9月9日《人民日报》。

③ 纪念陶行知诞辰 100 周年,李鹏 1991 年 10 月 3 日的题词,见同①。

④ 1995 年 3 月 24 日李岚清题词,见同①。

⑤⑱ 陆瑾等 1946 年纪念文章,见《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新北京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78 页。

⑥ 陈友松:《陶行知先生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学的源流之一》,见《陶行知全集》(12),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以下简称川版),第 931 页。

⑦⑪⑫⑳ 《陶行知全集》(川版)(2),第 335、242、406、556 页。

⑧⑮⑯⑳㉑㉒㉓ 《陶行知全集》(川版)(1),第 87、26、25、247、374、316、631 页。

⑨ 李维汉:《陶先生不死》,见《陶行知全集》(川版)(12),第 751 页。

⑩ 见重庆《新华日报》1946 年 7 月 27 日社论。

⑬⑳ 《陶行知全集》(川版)(11),第 717 页。

⑭⑲ 《陶行知全集》(川版)(4),第 4、644 页。

⑰ 吴树琴:《高大的身影》序,辛国俊主编,晓庄陶行知纪念馆、江阴华士实验学校陶行知研究会印《行知故事集》,第 1 页。

㉑ 重庆育才学校校歌。杨久礼、王继华编《陶行知诗歌歌曲集》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9 页。

㉒㉓ 《陶行知全集》(川版)(7),第 960、300 页。

㉔ 晓庄师范陶行知纪念馆、江阴市华士实验学校陶研会编:《高大的身影》,第 183 页。

㉕㉖ 《陶行知全集》(川版)(3),第 708、280 页。

㉗ 《陶行知全集》(川版)(6),第 428 页。

㉘㉙ 关于陶行知与保罗·郎格郎的终身教育思想,陈波教授在有关论文如《陶行知终身教育思想》、《新世纪的现代教育》(《丽水师专学报》2000 年 6 月号)等作过颇为详实的比较研究。毛泽东 1939 年 8 月 29 日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35 页。

㉚ 《陶行知全集》(川版)(12),第 882 页。

前言

《陶行知新论》的定名，主要是就个人写作说的。我已出版过几本陶研著作，发表了上百篇陶研文章，为了对以前的学习研究有一个推进，同时，这本专著是在新世纪之初出版的，世界在飞速变化，中国在突飞猛进，又是在《陶行知全集》（湘版八卷本、川版十二卷本）出齐以后问世的，学陶事业在大踏步前进，无论从空间思维还是时间思维视角，对陶行知的认知更趋向多元与丰富，主客观形势都要求陶行知研究有所进步与创新。说是“新论”，不是否定过去，而是有所发展罢了。如从总体看，大的方面说，我在书中的论述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领导、专家、大多数同行的当今已公开作品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基本一致的，就这个角度看，我的书无“新”可言，更无什么石破天惊之语，我也无心为“新”而“新”去标新立异，只是凭自己的认识与见闻，实事求是地去说去论去发掘，从当前中国建设事业、教育发展的实际以及陶研情况出发，说自认为应该说的道理与看法，这就会在许多方面论述的角度、深度上出现不同，甚至很不相同，如有新意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

通过这本书，我想说些什么呢？这本书如一座陶先生的宅院，它有五进，分五大块展开，每进又有若干大小不同的房舍。

第一篇进入门楼，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传主何许人也。自陶行知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他的总体评价大起大落又回升，走着“之”字形否定之否定的路。起，让他与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并起